



国际战略研究简报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Report

第35期

2009年7月7日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办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更好地维护我国在非洲的权益 ——参加第二届中津、中非关系研讨会的思考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王勇

第二届中津、中非关系国际研讨会 2009 年 5 月 19 日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举行。来自中国和津巴布韦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近百人，就中国模式、南部非洲地区一体化以及中非关系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本次研讨会是在津巴布韦国内政治经济发生重大变化后召开的。经过两轮大选，津执政党与反对党达成并实施分权协议，但未来政治前途尚存诸多不确定因素；今年年初以来，津政府放弃本币，采纳美元和南非货币兰特作为本国流通货币，物价趋于稳定，但经济状况尚无大的改善，人民生活依然贫困。同时，中津关系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在此背景下，由中国驻津大使馆协调召开的此次研讨会备受关注，一些西方研究机构也对研讨会进行了跟踪。下面笔者就研讨会涉及的有关内容，结合此次非洲之行的观察，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当前中非关系、中津关系均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国对非政策面临某些调整。

与会专家提出，中非关系已从过去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伙伴，过渡到当前促进中非“共同发展”的新阶段。中非关系的形式也从过去以政府间交往为主，过渡到政府间交往与民间交往并重。中非关系这种历史性的转变，既有非洲国家自身从追求独立解放过渡到当前大力推动国家发展的因素，也有中国和平崛起进程



中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与公民“走出去”等原因。笔者同意津巴布韦前驻华大使 Mutsvangwa 的看法，他说，2006 年北京中非峰会的召开标志着中非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2009 年，中津关系则开始进入一个人民对人民关系的时期。

中非关系的变化需要我们在继承中非传统友好关系的基础上，通过创新，发展出新的关系框架。正如南部非洲研究与文献中心（SARDC）主任菲莉丝·约翰逊（Phyllis Johnson）女士指出的，政府主导型的关系模式需要进行适时的调整与转变。

具体来说，这种转变需要进一步发挥官、产、学和社会团体的合力，通过工作机制与形式的创新，更好地推进中国在非洲的影响与利益。比如，本次研讨会由中国驻津使馆实际组织，中资企业天泽烟草公司出资，中津双方学术机构承办，由本地权威学术机构出面主办。这一组织形式调动了两国国内一流学术资源，增进了津巴布韦和南部非洲对中国的全面了解。

必须看到，中国虽然已经成为在非洲有着重要影响与重大利益的国家，但是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目前尚集中在商贸领域。中方对在欧美接受教育、长期受欧美影响的非洲上层精英的影响还十分有限，他们对华普遍不了解，甚至存在误解。因此，通过派出专家团，开展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和对话，将有助于改变非洲上层精英对中国的看法。我驻津使馆通过连续召开研讨会，开创了官产学协调合作，共同做第三世界国家工作的模式，有利于扩大我“软实力”，值得提倡和推广。

应重视中国公民“走出去”的组织与协调工作，发挥当地侨民社团的组织作用。津巴布韦华商协会近年来在团结华人华侨、阻止“法轮功”势力和卖淫嫖娼集团在当地落脚、组织资助慈善事业、改善当地华人形象等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的工作获得了中国驻津使馆的指导与鼓励。

二、中国发展模式引发非洲各国普遍关注，成为中国加强在非洲“软实力”的重要机遇。

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的成就及其独特发展道路，引发非洲国家的普遍关注。津巴布韦等国率先提出了“东向”政策，加大与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的联系。

笔者在研讨会上就“中国模式”四个特征所做的发言，引发了与会非洲学者与政要的热烈讨论。这四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对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时序的仔细考量，“先经后政”；二是保持执政党宪政地位的连续性与全社会思想、经济的大开放相结合；三是在经济多元化发展的同时保持了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使之成为抵御危机的“经济安定之锚”；四是对地方放权，发挥其发展经济的主动性，同时中央保持对地方最重要人事的任免权等。与会非洲人士表示，他们在发展本国经济时碰到了与中国类似的难题。中国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保持了政治、社会的稳定，对广大非洲国家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中国的发展经验可成为提升自己国



际“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还远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当然，在对非洲介绍“中国模式”的时候，不能单方面将中国的政治意志强加于非洲。可以通过类似研讨会的形式，让非洲国家上层政治与知识精英更多了解中国改革开放与治国理政方面的经验；同时也要强调借鉴中国经验必须与本国国情相结合。另外，对于中国发展进程中出现的腐败与环境恶化等问题不故意加以掩饰，而是进行有说服力的解释。研讨会上，笔者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杨光研究员就中国腐败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等问题进行了解答，得到了很好的反响。我们强调，腐败是中国改革开放、快速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也只能通过改革的办法加以解决。目前中国政府的反腐工作集中在加强制度建设和提高社会监督水平等方面。

此外，扩大中国游客到非洲的数量，也是增强中国“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中国旅游团组消费水平较高，个人旅游装备高档电子化，他们的到来既是对当地经济的帮助，同时也是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成果的展示。如果我们将中国赴非旅行团与改革开放之初欧美日旅游团来华旅游造成的心理冲击力加以比较，就不难理解其中的道理。加强对中国游客的管理，可以增进中国对于非洲当地人民的吸引力。非洲国家对于中国公民赴当地旅游也持十分欢迎的态度。与会津巴布韦学者、政要提出，中国人来津观光将为津方提供十分短缺的外汇，因此，他们建议中津双方携手，大力开发旅游业，提高中国公民赴津旅游人数。

三、提高津巴布韦在我对非洲战略布局中的地位，加大制造业投资，使其成为我向邻近地区发展的“桥头堡”。

津巴布韦自然资源丰富，气候宜人，国民受教育程度高，工资水平低，发展潜力巨大。当年英国政府就将津巴布韦作为一个海外省加以建设，在基础设施方面投入甚多（当地不少人至今肯定他们的贡献），可见津在其海外战略中的重要地位。津有条件成为我进一步走进非洲、开拓多方面利益的重镇，同时，它也可成为我向邻近地区发展的“桥头堡”。目前，津政经格局处于关键过渡期，中津双边关系也处于一个重要的调整关头。如果处置不当，有可能丢掉这一块来之不易的阵地。有关方面应从战略高度认识到津对我在非洲利益的重要性，通盘考虑有关对津政策设计。

面对津政局当前的转折期，我应当在通盘考虑的基础上，加大对津援助，同时发展与执政党、反对党的良好关系，以适应其未来政治变化的需要。这个方面，我驻津使馆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实效。

应大力促进中国有条件的制造业企业投资津巴布韦，改变当前双边经贸关系以经销中国商品与矿业开采为主的不平衡格局。某些西方和非洲本地媒体指责中国在非洲的发展具有“新殖民主义”的性质，这种指责显然毫无根据。但是，我们也应



当尽快改变我当前在非洲利益过于倾向于矿产开采和经销“中国制造”商品的局面。根据当地的需要，引导中国加工制造业企业扩大在非洲的投资，增加当地人的就业机会，改善地方民生，有助于改善中国形象，将是对“中国新殖民论”的最好驳斥。当前津政局趋于稳定，物价趋于平稳，中国制造业企业进入的时机更加成熟。日、法、韩等国企业已开始进入。我们应当从维护中国长远利益的角度出发，抓住机遇，加大投资。相信在良好的中津关系的帮助下，中国企业将可以得到较大的发展空间。

此外，中方还可以认真考虑增加对津恢复经济、重建货币体系工作的援助。研讨会上部分津巴布韦学者提出，中国经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成就，已经具备较大规模援助非洲的能力，但如同南部非洲国家某些人士所指出的，在全球金融危机面前，中国作为津巴布韦最重要的朋友，仅仅给予了500万美元的援助，这与中津关系的性质不符。笔者认为，这种对于中津关系的怀疑态度不是个别现象，应重视这种不满情绪。就在研讨会召开之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派出经济专家组到津，就重建货币体系问题开展调研，中方应密切关注这一动向，以免西方国家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插手，造成中津关系上的被动。

在推动中津货币合作关系方面，有津专家提出，中国可以考虑从外汇储备中拿出7亿美元，作为津恢复本国货币的基金，并指出曾向中方提出过该建议但未获回应。津前驻华大使 Mutsvangwa 提出，中津双方可以签署货币互换协议，以支持津货币改革计划。

四、加强官、产、学、社会协调，提升我国非洲研究水平，为中国企业与公民“走出去”提供智力支持。

据有关方面介绍，当前我国非洲问题研究队伍规模较小，只有100人左右，各种形式的投入不足，研究人员知识结构较为单一，缺乏有综合学科背景知识的专家的参与。研究人员多为非洲某国问题的专家，缺乏对整个非洲政治经济安全问题的宏观把握，在国际场合上较难开展有效对话。这种情况远远不能适应我对非利益快速增长的需要。要改变这种局面，除了学术界加强跨学科研讨，加快综合研究人才培养外，政府相关部门和工商界也需提供更多的研究资金支持。笔者认为，我驻津使馆通过连续召开研讨会的形式，不仅开创了官产学相互协调、共同做所在国工作的新模式，而且整合了国内一流学术资源（包括非洲问题专家与其他国际问题专家），促进了学术界内部的有效交流。这种形式的研讨会成果丰富，值得大力提倡。

编辑：于铁军 审核：王缉思
网址：www.ciss.pku.edu.cn
邮件地址：CISS@pku.edu.cn

地址：北京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电话：86-10-62756530

邮编：100871
传真：86-10-62759302